

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LUN LIANGQICHAO DE LIUZHIXING YU ZHUANXINGQI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 PINGE

罗义华 著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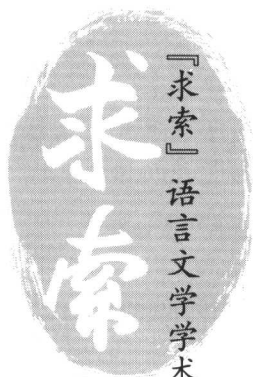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LUN LIANGQICHAO DE LIUZHIXING YU ZHUANXINGQI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 PINGE

罗义华 著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罗义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5622-3508-8

I. 论… II. 罗…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人物研究 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B259.1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483 号

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 罗义华 著

责任编辑:谢 琴

责任校对:章光琼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94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作者简介

罗义华，男，1970年生，祖籍湖北省荆门市。先后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中文系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民族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江汉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合著一部：《李魁贤诗歌艺术通论》。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化语词类谭 \ 王作新 著

古代文论的多维透视 \ 邓新华 著

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 \ 刘月新 著

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 邓莹辉 著

三种《华严》及其经典阐释研究 \ 桑大鹏 著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 \ 王前程 著

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 \ 彭红卫 著

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 \ 罗凌 著

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 罗义华 著

闻一多现代品格论 \ 胡绍华 著

三峡大学文学院
“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任:刘德富

副主任:李建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新	王前程	邓新华	田斌
刘月新	吴卫华	陈和春	李建国
张朔	范军	赵宏	胡绍华
段维	曾巍		

总 序

王先霭

三峡大学文学院组织出版“‘求索’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整体地展示本院教师最新的重要学术成果，第一批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即将面世。这是他们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学院领导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构想和当前的进展，嘱咐我就此写一点文字。我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及其前身宜昌师专中文系的多位同行交往几十年，对学院的发展轨迹有所了解，可以借此谈谈我对这个学术团队的观察和由此而生的感想。

从宜昌师专所在的北山坡，到今天三峡大学的葛洲坝与三峡大坝近边依山傍水的主校区，地理距离并不远，而几十年来几代人所经历的创业历程，却是并不平坦单纯，而有着十分丰富厚重的内涵。在学科建设中，传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无形的力量，文科尤其如此。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一个学术团队不可能于朝夕间突兀而起，更难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宜昌师专中文系的老师们，是一批非常敬业的园丁，倾注心力于教学，同时也在各自选定的领域学有专攻，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撰写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带出了一批批后继学者。本丛书的作者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今正是治学的黄金年龄。他们曾分别到国内多所大学攻读学位、进修和访学，既仰承本校先行者们的纯朴作风，又广泛吸纳校外、省外和国外多种学术营养，最近十年左右，陆续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都有稳定的学术方向，从我十幾年来的接触，从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不难看出他们在求索之途跋涉的清晰脚印，而本文库里的专著则多是作者在稳定方向上的新成果。我比较赞赏稳步渐进的治学方式，我以为，

《荀子·劝学》说的“螭蛇无足而飞，鼯鼠五技而穷”，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学无定向，常常导致学无定见。趋时跟风，可以煊赫于一时，最终则消歇于长久。治学首先是个体独立的精神劳作，求索者要准备着经受孤独。但这绝不是主张单兵独人各自为战，恰恰相反，在一个院系、一个专业里，大家都应有整体意识，有学术上的交流、交融和碰撞。然而，也只有各人有专攻、有特长才能有效地交流、交融和碰撞，交流、交融和碰撞必须建立在大家各自独立思考和张扬学术个性的基础之上。本文库的作者们，分属若干二级学科，就我的了解，其中，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力量较强，而语言类和文学类彼此呼应，有竞争更有协作。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的配合相当重要。在自然界，物种多样、结构多层的环境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在一个院系，所属二级学科既要有重点，又要有相对的和动态的均衡发展，这才有利于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各个学科和各个成员适应当代社会的急速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三峡大学文学学院的进步，与他们学术生态的合理是大有关系的，这套文库将有利于他们学术生态的进一步合理化。

现在看到的收入文库里的第一批著作，其学术含量彼此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也使我们可以期望，后续的作品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文库以“求索”为名，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术之路是无尽的，学者生命的价值在无休止的探求之中，最灿烂的明珠永远在我们的前面闪耀。

2007年3月26日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论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5)
第二章 “流质易变”:文学气质与时代焦虑	(11)
第一节 “流质易变”:从政治、学术到文学	(11)
第二节 “流质易变”与梁启超的文学家气质	(26)
第三节 “流质易变”与时代焦虑	(33)
第三章 “流质易变”:政治与文化	(47)
第一节 “流质易变”:在革命与改良之间	(47)
第二节 “流质易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68)
第三节 《新中国未来记》:政治、文化与文学	(85)
第四章 “流质性”与现代性	(97)
第一节 “流质性”、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	(97)
第二节 从传统到现代:对“流质性”的一种理解	(110)
第三节 转型期文学现代品格的内涵、形态及其流动性	(118)
第五章 现代品格的多面性与自我调适	
——“流质性”视野下的梁、胡文化论战	(135)
第一节 两次论战与梁启超的文化立场	(135)
第二节 功利主义与偶像破坏——对论战的一种理解	(142)
第三节 现代品格的多面性与自我调适	(148)
第六章 “流质性”:转型期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尚待敞开的话题	(157)
第一节 “流质性”视野下严复政治及其学术思想历程	(157)

第二节 “流质性”视野下王国维政治及其学术思想历程	(164)
第三节 “流质性”视野下胡适政治及其学术思想历程	(169)
第四节 “流质性”视野下鲁迅文学思想与文学立场的转变	(177)
第五节 “流质性”视野下创造社作家群的思想立场与创作活动	(182)
第七章 余论：“流质性”话语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91)
第一节 “流质性”话语在梁启超研究领域的理论意义	(191)
第二节 “流质性”话语在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意义	(194)
主要参考文献	(197)
后记	(21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论题的缘起

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影响巨大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学、宗教、教育等领域广泛涉猎,富有创见却又精细不足。梁启超生前即以“流变”著称,对于梁氏的“多变”,严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生前都有提及。梁启超刚开始受学于万木草堂时,康有为即以“流质相戒”;十年后康有为又呵斥他“流质易变”^①;1910年康有为再次责备说,“汝真一极流之质”,“望汝后勿再流而已”^②。孙中山说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③。章太炎说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失其权衡,是其心固非有定见者”^④。黄遵宪也说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⑤。

在师生决裂的时候,康有为痛骂其“视此(指反复辟事——引者注)为投机事业”,他在致学生的信函中说道:“生戊戌以来,以保皇派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

① 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页。

② 康有为:《致梁启超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

③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

④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371页。

⑤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1页。

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今日又赞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生他日必别有所适，反复叵测，生固以为因物附物。”^①此语不可不谓尖锐痛深。谭人凤则谓其“卖朋友，事仇讎，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②。其他如王森然等人也认为“先生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之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甚可惜也”^③。

与此相反，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指出梁氏“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④。对于梁启超放弃其自创一格的文言文而以“五四”后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作，郑振铎夸赞他“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并指出“这便是年龄，便是时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态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并没有什么别样的理由”^⑤。对于他的“善变”，郑振铎认为：

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动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4页。

②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483页。

③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④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⑤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困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竭力的说明保国与保教的不同，而力与他自己前几年的主张相战。^①

另外，郑振铎认为梁氏“感觉最灵敏”，“感情最丰富”，“所以四周环境里一有显著的变动，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他又是一位“极能服善的人”，“他并不谬执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的”；还有他的“急于用世”，这都是他“善变”的原因^②。

梁启超自己并不回避“善变”这一问题，他曾多次描述总结自己的变化，他在《饮冰室文集·原序》中反省自己说：“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他在《三十自述》中记载了青少年时治帖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谦逊地指出自己“太无成见”，“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一方面他一再声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另一方面他亦意识到“流质多变”所带来的种种不足与缺憾。他在写给女儿梁令娴的《题〈艺蘅馆日记〉第一编》一诗中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不可不谓语重心长。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梁氏的“流质多变”呢？

中国学术界对梁氏的“善变”、“流质易变”、“流质多变”的理解与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的倾向。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波谲云诡的一生，使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而在批评空间日趋逼仄的时候，对梁启超的非理性的批评则可能占据上

①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②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9、90页。

风。在 20 世纪 30 年代,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认为梁氏“随时转移,前后矛盾”,40 年代末出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吴泽著,上海华夏书店,1948 年)则开了对梁启超的全面否定的先河,在这样的情形下,梁氏的“善变”就被解释为“权谋”、“投机”和“反复无常”,是小人品质或反动本质的外在表现。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这种批评论调减少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李泽厚认为梁启超“不是什么重要的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①。他将此原因归结为“梁浅、杂而多变”^②。郭驰则认为梁启超一生的思想从未脱离过“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三个不变因素。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急切的救亡之志,除了使他产生过“虚君共和”之类的保守主张外,也曾经促使他产生过激进的革命共和主张。在救亡图存的爱国前提之下,梁启超从不局限于某一种主张,他既不绝对地反对“革命共和”,也不僵硬地坚持“立宪改良”。他坚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同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异常薄弱的现实所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导致他时而倾向革命时而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梁启超一生思想多变与他思想不够深刻有关”^③。也有论者认为,作为 20 世纪初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梁启超以其多变而著称,这同其“流质善变”的个性气质有关,也反映出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复

① 李泽厚是相当肯定梁启超的宣传作用的,他认为,“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不可抹杀,它几乎抵消了梁一生的错误而有余”。又说,“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安排了一根由不满清朝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746~753 页)

②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713 页。

③ 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潮》,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5 页。

杂和艰难^①。

归结起来,国内学术界对梁启超“善变”、“多变”的看法与态度主要有三种:一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这种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突出;二是持肯定态度,为之辩护,如郭驰等;三是在从总体上肯定梁启超思想和贡献的同时,强调“多变”这一瑕疵给梁启超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对这三种情形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学界对“善变”、“流质多变”的观照,缺乏应有的学术高度,很少进行有关“流质易变”的专题研究,郭驰的《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是个例外,但是这篇文章从总体上并没有超越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梁氏“善变”与“多变”的辩护。

这就牵引出了一个问题:梁启超的“流质易变”本身能构成一个学术问题吗?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以及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又在哪里呢?这构成了本书写作的缘起。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梁启超兴趣广泛、著述丰厚,他的一生留下了约1400万字的作品,在他生前身后,有多种文集面世,而以1936年由林志钧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为最重要的研究文本。1983年由丁文江与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内容详实,条理分明,把梁启超学术、政治、人生的种种线索如实勾勒出来,成为研究者除《饮冰室合集》之外最有参照意义的研究资料。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全集》,不过,这部全集似乎由于编辑体例等因素,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倒是1989年中华书局所出新版《饮冰室合集》一再翻印,为研究者所注意。2005年,夏晓虹教授主编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面世,这是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将《饮冰室合集》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对照统一,能更好地丰富研究者的视野,如果再加上“书信”,以及《追忆梁启超》(夏晓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① 王敏:《启蒙与反思——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史林》,2003年第3期。

等研究著述,就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研究资料的完整性。此外,有很多文集也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如李华兴、吴嘉勋编的《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录有多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的篇章,最重要的是,编者将所选《饮冰室合集》中的文字,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的原稿对照,在写作、发表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出版谬误上作了宝贵的校正,成为梁启超各种文集选本的一个经典。夏晓虹编的《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以其鲜明的编辑体例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文本。此外,还有梁启超文集的校注本(如朱维铮对《清代学术概论》等梁启超单行文本的校注),以及葛懋春、蒋俊编选的《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李国俊的《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也是研究者很好的参考资料。这些都是梁启超研究领域最基本的资料,也是本书研究的基础。

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成为许多研究者解剖近现代文化史的一个典型个案^①。梁氏在其有生之年与日本、欧美、中国台湾都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在欧美、日本、中国台湾陆续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台湾更是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镇。

1953年,美国作家约瑟夫·阿·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此书在国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问世,标志着梁启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这部作品从中西文化的对话结构上考察梁启超思想迂回曲折的变化历程,其中虽有不少失当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其立论新颖、独到,处处闪耀着思想者的火花,尤其是他对梁启超与

^① 有鉴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夏晓虹称梁启超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她为此加注说,“就其随时进步而言,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故可以完整反映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历程。而康有为、严复、林纾、章太炎等人便不具备这种完整性”。(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孙中山(改良与革命)关系的论说,突破了梁启超研究领域的“革命道德”至上的一个预设前提,为真正洞开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为后来种种研究的进展开启了一扇大门。虽然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力图否定或校正列文森观念的谬误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几乎所有后来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受益于这部作品。无论如何,在列文森与其他研究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多层次的对话关系,这是梁启超研究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1971年,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此书在国内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从与列文森的对话出发,系统研究梁启超在两个时期思想的构成、发展及其变化,与列文森主要着眼于西方近代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研究不同,张灏更注重传统中国文化与梁启超根深蒂固的关系;与列文森关注梁启超与后来者的差异性不同,张灏更多地注意到梁启超思想中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精神意义。这同样是梁启超研究领域的一部佳作。

1972年,黄宗智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一书探讨了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关系,将梁视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黄宗智在书中将“自由主义”思想看作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观点还值得商榷。梁启超虽然曾经倡导“自由”之说,但是他同时特别强调“群体”与“国家”对“个体”的优先意义,在康有为对其“自由”说提出批判后,梁启超后来就很少谈及此说了。比较而言,胡适才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也未曾放弃对“自由”之义的诉求。

上述三本研究著作具有相当的开拓性。在日本,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等人长期从事“梁启超——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的相关课题研究,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狭间直树等人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在台湾,张朋园教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